

## 干祿文章老更成 ——析韓愈《三上宰相書》及《進學解》

史禮心

(北方工業大學文法學院)

列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的韓愈，其散文受到歐陽修之後的歷代文人的極高評價，對其名篇更是褒賞有加。《進學解》就是這樣的名篇。韓愈在寫作此文後不久，即被當時的宰相提拔了官職，可見此文的威力之大，文采之妙。不過有意思的是，韓愈在十八年前，也曾寫過相同目的的三篇文章上書宰相，却如石沉大海，未給他帶來絲毫利益。這三篇上宰相書也受到後人的好評，但其干謁的效果却遠不如《進學解》，不少學者認為是時遇不同所致，即當時的宰相不像十八年後的宰相那樣愛才，那樣汲汲于獎拔人才。果真如此嗎？筆者則以為，十八年的歲月，經歷了若干次的“因文招禍”之後，不管是作人還是為文，韓愈都圓熟、老到了不少。認真對讀這相隔了十八年的前後兩組文章，也許可以尋覓到一些蛛絲馬跡。

韓愈於德宗貞元十一年(795，據韓文中“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”句推算)，在“三選於吏部卒無成”之際，先後三次向時相上書，即《上宰相書》、《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》、《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》<sup>[1]</sup> (下分別簡稱為《上宰相書》、《復上宰相書》、《三上宰相書》)，冀求援引，薦己為官。這是三篇“情隘辭蹙”的干祿文字，寫得“異樣窮迫，異樣懇切，雖使石人聞之，亦當下淚”<sup>[2]</sup>。然而時相不僅沒落淚，不“垂憐”，甚且連隻字片語的答復也沒有，“見三書而漠無一報”<sup>[3]</sup>，宰相何其之忍哉！

論者考定，貞元十一年左右時任相的有三位：趙憬、賈耽、盧邁。清人林雲銘是這樣評價這三位時相的：

賈耽為相十三年，於安危大事，無有發明；盧邁在位，僅治身循法，無他過而已；(趙憬)真小人之雄者。<sup>[4]</sup>

論者認為，韓愈受如此冷遇，是由於碰上了庸碌無為、不識貨、不愛才的三宰相中的一位；若是碰上一位“文章知己”、“愛才汲引”<sup>[5]</sup>的賢相(如權德輿、李絳之流)，那他就很有可能得到賞識，甚至由此而躋身宦途。

這種分析或假設不無道理。但當筆者細細地研讀了韓氏“三書”之後，却“發現”韓氏文章的寫法也存在着問題，這問題就是，年少氣銳的他在書中說了一些不合時宜、宰相“不愛聽”的話，惹得宰相不高興，宰相因而“無一報”，當然也就影響了韓氏求官求爵的寫作目的。換言之，“無一報”的根本原因，是韓愈的上書不中聽，不能打動宰相，當然也就不會得到憐惜及擢拔，責任在韓愈而不在時相，這是筆者的一孔之見。駁詰者或曰：子非相，安知相之思。韓愈文中所表現出的奇思妙才，宰相不會看不出來，除非他們庸碌無為，或者妒賢嫉能。總之，韓氏未得擢拔的委屈，純是趙、賈、盧三位中的一位造成的。

這話也不無道理。但筆者也反駁一句：子也非相，又安知相不如此之思？韓氏雖有奇思妙才，但他畢竟年輕，“年少氣銳，自負其學”<sup>[6]</sup>、“直言無諱，而不犯嫌忌”<sup>[7]</sup>，炫鬻干進，露才揚學之餘，小孩家口沒遮攔也情所難免；“無一報”之結果，也許就是韓文欠思量所致。筆者認為這推測不無道理，故撰文予以細說。

韓氏上書說了哪些宰相不愛聽的話呢？不妨逐一引析。

《上宰相書》“就相之待士言”“以待士統體言”<sup>[8]</sup>，篇中引經據典，大談為相應如何“長育人材，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”的大道理，“通篇大旨，不過長育人材，教育人材，乃宰相之責”<sup>[9]</sup>。文章一開始就引《詩序》“菁菁者莪，樂育材也”之說，次引解經之眾論，“言君子之于人材無所不取”，再引《孟子》“樂得天下之英而教育之”的“聖人賢士”之“極言至論”，又拾出“古之君子之相其君”的榜樣做法：“一夫不獲其所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”，再言《洪範》“君子”對求謁之人要安以顏色、謙遜抑退的禮賢下土的告誡……“惟恐言之不盡，不禁反復引伸，滔滔汨汨至此”<sup>[10]</sup>。

韓氏滔滔不絕、博引經典的“育材”理論，盡顯了他的學問功底，也暴露了他涉世未深的幼稚！這是由於：第一，這些“育材”理論雖然說得頭頭是道、無懈可擊，“放之四海而皆準”，但並不新鮮，也略有顯示自己比領導還高明之嫌。站在宰相的立場上言：身居臺宰、飽讀經書的我輩難道不知道“長育人材、教育英才”乃其“之責”嗎？何需你翻檢故紙堆，再三提起！你顯擺什麼？是你當領導，還是我當領導？宰相未必沒有此思！第二，韓氏引經據典，大講“古之君子”“相其君”的做法，難免不使宰相產生這樣的想法：你這個後生小子的意思，是我這回非得薦舉你不可，否則我就是“失責”，就不是“君子”！一旦宰相有了這樣的想法，對於急於求官的年輕人的去取態度，其實也就不言自明了。

《上宰相書》還有一句筆者認為會使宰相皺眉頭、甚至嗤之以鼻的話，即“上之求於人，下之求於位，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”。其意為：上司要得到人才，下級要謀求官職，二者之間的需求是一樣的。換句時髦的話說，彼此相得即能“雙贏”。話雖然可以這麼說，但放在此時此際的干求上，却顯得太天真了！宰相難免不暗生冷笑：明明是你來謀官干祿，反過來又說彼此相需；到底是你需，還是我需？是你急，還是我急？平心而論，這些話說給肚裏能撐船的“賢相”聽聽，“賢相”都未必不“怫然”，更何況趙、賈、盧三位是否有那樣的好肚量，其結果可知矣。

有了這些領導不愛聽的話，因而儘管《上宰相書》中，韓氏反反復復地訴說自己如何“讀書著文，歌頌堯舜之道”，如何“居窮守約”“以求知於天下”，現在的境遇是如何淒涼：“遑遑乎四海無所歸，恤恤乎饑不得食，寒不得衣，瀕於死而益固”，但宰相並未被感動，還是無動於衷。《上宰相書》被置之高閣是肯定無疑的了。韓氏當然不知道他的上書已被置之高閣，他還在癡心地等待宰相的復音，還在做着做官的夢。但十九天以後，他等不及了，因而就有了《復上宰相書》。

《復上宰相書》“單就前書中所云負才不遇處，以蹈水火為喻……未復以居上位不宜推諉于時，在宰相尤可取必於君，而布衣不至有負於舉三意，為異樣聳動，異樣勸勉，以堅其意。”<sup>[11]</sup>，“所見似悲戚，而文則宕逸可誦”<sup>[12]</sup>。篇幅不長，但滿紙哀鳴。在《復上宰相書》中，韓氏極言自己“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”，以此希冀“君子”“動心”，拯救其於水火之中。甚且降低身份，自比為“盜賊管庫”，欲宰相“垂憐”，授予他一官半職。

然而韓氏在《復上宰相書》中又重複了《上宰相書》中的錯誤，情急之下，他質問宰相：“前五六年時，宰相薦聞，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，與今豈異時哉？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，無問于已仕未仕者，況在宰相，吾君所尊敬者，而曰不可乎？”這段話大意是這樣：前幾年作宰相的連“布衣”都薦舉，現在對於我怎麼就如此漠不關心？時勢有什麼不同？現在連節度觀察使等官員，尚且能自薦判官，況且您這位國君都尊敬的大宰相，能說不行嗎？這種志在必得、咄咄逼人

的帶有“將一軍”性質的筆法，宰相能喜歡聽嗎？筆者認為，這也是《復上宰相書》仍不被理睬的一個原因。

韓氏並不就此甘休，在求官干祿方面，他是有耐性、有韌性的，等了近一個月，不見宰相回音，他再次上書，因之就有了《三上宰相書》。

《三上宰相書》“單就宰相當急於求士上立言”<sup>[13]</sup>，“通篇將周公與時相兩兩作對照”<sup>[14]</sup>。文中在寫到周朝天下已大治，但周公尚且“方一食，三吐其哺；方一沐，三握其髮”，急急於推賢進能後，接下問道：現世有像周朝一樣太平大治嗎？既然沒有，今宰相“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”，對自己“亦宜引而進之，察其所以而去就之，不宜默默而已也”。這是在發洩“二不報”的怨氣，也是在詰問、批評宰相對自己“漠然”的做法；拾周公就是為了壓時相，時相會作何感想？《三上宰相書》之後，仍杳無言信，就說明時相的態度了。

韓氏三上宰相書，“氣傑神旺，骨勁格高，足稱絕唱”<sup>[15]</sup>，“筆致跌宕繚繞，真千古無匹矣”<sup>[16]</sup>，前人稱譽有加，但果真就那麼完美無缺嗎？不然！文章逞才之意可見，躁進之態可察；逞才和躁進的結果，就顯得有點急不擇言，就說出了那些筆者認為宰相不愛聽的話，產生了負面效應，影響了干進。論者把“無一報”完全歸咎于趙、賈、盧三相而未從韓文本身找原因，是對韓氏其人其文的過於偏愛所致。

平心而論，趙、賈、盧三位在唐相中雖不是大有作為、聲名卓著的“英傑”，但也決非苟且偷安、貪財受賄、妬賢忌能之輩，而其個人品質更是無可厚非。史載趙憬“志行峻潔，不自炫賈”，“精治道，常以國本在選賢、節用、薄賦斂、寬刑罰，懇懇為天子言之”；“性情約，位台宰，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。得稟人，先建家廟，而竟不營產”；而其不記前嫌，擢崔儆、令狐峘之事蹟，也使得時人交口稱讚，“人以為賢”。盧邁“性孝友”，在“陸贄、趙憬專大政”之際，“治身循法無它過”，“再娶無子，或勸畜姬媵，對曰：‘兄弟之子，猶子也，可以主後。’所得稟賜，皆賑姻舊之乏”。賈耽是有名的地理學家，在任汾州刺史時，“治凡七年，政有異績”，史評“其器恢然，蓋長者也，不喜臧否人物。為相十三年，雖安危大事無所發明，而檢身厲行，自其所長。每歸第，對賓客無少倦，家人近習，不見其喜愠，而謂淳德有常者”<sup>[17]</sup>。三相有沒有推賢舉能、獎掖人才的事蹟，史書無載，但韓氏《復上宰相書》中有“前五六年時，宰相薦聞，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”句，可見時相還是有“薦聞”士人的記錄，不是“巍然以先達自居，不復求士”<sup>[18]</sup>的純粹尸位素餐者。揆之史傳對趙、賈、盧事蹟及為人處世的記載，三相之中任何一相，對於韓氏這位文章已嶄露頭角的新科進士的連連上書置若罔聞、隻字不報的做法，都是有悖情理且有損於其揚令名之事，時相似不應如此冷漠和居傲。筆者認為，這是韓文欠思量、某些說法令宰相不高興而遭致“無一報”的結局。雖是推測之辭，但也未必沒有道理。

然則，寫給宰相的文章，要如何寫才能讓宰相“愛聽”，達到求官求祿的目的，其中又有哪些講究，筆者當然回答不了這個問題，好在韓氏自己有文章能夠回答這個問題，這就是我們開篇提到的韓氏名篇《進學解》。

## 二

《進學解》作於憲宗元和八年(813)，距三篇《上宰相書》有十八年之久。《舊唐書·韓愈傳》記載，“(愈)復為國子博士，愈自以才高，累被擯黜，作《進學解》以自喻，執政覽其文……以其有史才，改比部郎中，史館修撰”<sup>[19]</sup>。這意思就是說，由於《進學解》這篇文章，執政(宰相)欣賞韓氏的才學，提升了他的官職。元和八年前後的宰相是誰？論者曰：是權德輿、李絳。“權德輿、李絳，皆有文名，自然針芥相投，愛才汲引，不比貞元中趙憬輩，見三書而漠無一報也。嗚呼！文章知己，豈不以其氣

類哉！”<sup>[20]</sup>十八年前韓氏碰上一位不“愛才”的宰相，他倒了霉，儘管連續上書干求，還是當不了官，這叫“有意栽花花不發”；十八年後，偶然一篇文章，由於碰到一位“愛才”的宰相，韓氏因得“汲引”而升官晉爵，這叫“無心插柳柳成蔭”。事情果真如此嗎？筆者每當讀到《舊唐書》這段記載時，都產生這樣的疑問：《進學解》之前，韓氏文章已名滿天下，“執政”怎麼就沒有發現其“史才”而給其提官提爵？一篇辭賦體的散文，怎麼就能盡顯其“史才”而得到擢升呢？

伴隨這疑問，筆者對解放後出版的一些著作中涉及《進學解》評價時的一些提法也產生疑惑。茲引數則，以見其概：

《進學解》和《送窮文》用對話形式，以自嘲為自誇，以反語為諷刺，對當時社會的庸俗腐敗，表現了一個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現實中不能妥協的精神<sup>[21]</sup>。

這篇文章就是他再任國子博士時寫的，主要在指責當時的執政者（宰相）不識賢愚，大材小用。但是，它的表現形式十分巧妙，通過國子先生訓誨諸生，諸生加以反駁的對話方式，借諸生的口，發洩自己胸中的怨憤<sup>[22]</sup>。

文章借國子先生與弟子的對話，抒發作者長期不受重用，反遭貶斥的不滿情緒，也暗寫着對當時執政者不才德取人，用人不公不明的諷刺<sup>[23]</sup>。

筆者的疑惑是：《進學解》既是如此“諷刺”、“指責”“執政”“不識賢愚”、“用人不公不明”，“執政”為什麼還擢升他？莫非“執政”看不出其中“諷刺”、“指責”的意味，被韓氏“諷刺”、“指責”了還感到舒服，還為他叫好？

論者或曰：這正是《進學解》表現形式的巧妙之處呀！筆者則曰：千萬不要低估了這些“執政”的智商。他們放在現代，以其國學功底，當個國學博導應該綽綽有餘。這些時相（如權德輿、李絳）不是沒頭腦之輩，不管文中如何“暗寓”，表現形式如何“巧妙”，如何巧用“反語”，“執政”不會看不出來，甚至“嗅”不出來！

論者或曰：這正是由於韓氏遇上了識才且好肚量的“賢相”的緣故呀！筆者則曰：這話也是說說而已！挨了人罵還幫人升官的宰相，在整個中國封建史上，不能說是絕無僅有，但也屬鳳毛麟角；權、李二位沒有此“優秀記錄”，趙憬倒是有此記錄（見前文）。因之，這種可能性不大。

那麼，韓氏“無心插柳柳成蔭”、升官晉爵的原因是什麼？答曰：還是韓氏在《進學解》中說了宰相“愛聽”的話！不過，需更正一句：韓氏不是“無心”，而是有心！

這“有心”，就“有心”在這篇文章是做給時相看的。清人吳調侯、吳楚材認為：《進學解》“主意全在宰相”<sup>[24]</sup>，這是極有見地之談。既然是做給時相看的，就必須顧及時相的感受。要發牢騷、泄怨憤，又要使時相不產生反感，就必須說些時相愛聽的話，而不是“指責”或“諷刺”——韓氏在構撰此文時，必須充分考慮這一點。

《進學解》有哪些時相愛聽的話呢？我們看下面這兩段：

方今聖賢相逢，治具畢張。拔去凶邪，登崇俊良。占小善者率以錄，名一藝者無不庸。爬羅剔抉，刮垢磨光。蓋有幸而獲選，孰云多而不揚？諸生業患不能精，無患有司之不明；行患不能成，無患有司之不公。

夫大木為杗，細木為桷，構榑侏儒，椳闌扂楔，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；玉札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馬勃，敗鼓之皮，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，醫師之良也；登明選公，雜進巧拙，紆徐為妍，卓犖為傑，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，宰相之方也<sup>[25]</sup>。

這兩段話歷來都被一些評論者認為是反語，是諷刺時政、時相，是用“反語”道出了韓氏的正面主張。筆者實在看不出這兩段話中哪些地方是“反語”、含“諷刺”！這裏有的是對當今“清明”政治的美化詠歎，對時相公正、明察的稱頌，對時相統籌安排工作的體貼和理解，何“反”之有，何“諷”之含？筆

者甚且認為，當時相讀了《進學解》以後會非常感動地說：“退之終是愛君相矣，其才高位卑，確是我輩失才之過，宜速晉之。”

如果非要把這兩段時相“愛聽”的話，理解為反語、諷刺，那麼對下面韓氏的“諛詞”，我們不知道要作何理解：

愈來京師，於今十五年。……未見有赤心事上、憂國如家如閣下者……愈也少從事于文學，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，雖在千百年之前，猶敬而恭之，況親逢閣下，得不候於左右，以求效其懇懇<sup>[26]</sup>？

這是韓氏於貞元十九年(803)夏天，寫給時任檢校工部尚書兼京兆尹李實信中的一段話。李實是封王的宗支，韓氏願“效其懇懇”，因而對其百般頌揚，其目的無非也是希望李實能提携他。但李實其實是一個貪贓枉法的貴族官僚，後被貶為通州長史。韓氏後在《論天旱人饑狀》及《順宗實錄》中對其多有攻訐。據此，難道也可把韓氏先前書中對李實的吹捧視為反語、諷刺？

穆宗時，工部尚書鄭權出為嶺南節度使，卿大夫相率為詩送之。韓氏詩序稱鄭“功德可稱道”、“家屬百人，無數畝之宅，僦屋以居，可謂貴而能貧、為仁者不富之效也”<sup>[27]</sup>。但鄭權却是地地道道的一位“貪邪之士”。韓氏的做法，使得南宋洪邁也大惑不解：“然則其為人，乃貪邪之士爾，韓公以為仁者何邪？”<sup>[28]</sup>韓氏對鄭權的頌諛難道也是反語、諷刺？

相似的例子在《韓昌黎集》中還為數不少。如果要把韓氏對當時的權貴(不是“賢相”，而是一些貪鄙的官僚、宦官，如俱文珍)的一些“諛詞”統統視為反語、諷刺的話，那麼韓氏簡直就是一位先知先覺的大無畏鬥士！

韓氏作《進學解》之時，宰相據說是素有“文名”、“愛才汲引”的權德輿、李絳，若此，韓氏有必要或敢於諷刺、指責他們嗎？不錯，韓氏確實是為自己“才高”、“累被擯黜”而感到委屈、不滿，他要發洩這一腔怨憤，但他雖滿腹牢騷，却充滿期待；雖憤憤不平，却仍奮力攀升；雖對“執政”心存怨懟，但仍要借重王公大人以躡進。寫《進學解》之前是如此，寫《進學解》之後仍是如此。“未嘗干之，不可謂上無其人”<sup>[29]</sup>也，《進學解》真的是“諷刺”、“指責”之書嗎？所謂“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現實中不妥協的精神”之評價，如果不是在有意抬高或虛美，那麼恰恰是對韓氏汲汲孜孜於干祿的絕妙“諷刺”！

《進學解》是一篇被歷代選家和評論家讚譽有加的文章，幾乎所有的古文選本都選錄它。所謂“拔地倚天，句句欲活，讀之如赤手捕長蛇，不施控騎生馬，急不得暇，莫可捉搦，又似遠人太興城，茫然自失”<sup>[30]</sup>；所謂“其體自漢人來，其文則漢未有。自此文出，而《客難》、《解嘲》、《賓戲》接踵仿效者，於乎絕矣。信乎其能超前而斷後也”<sup>[31]</sup>；所謂“勿論《七發》、《七哀》等不足比倫，即《賓戲》、《解嘲》等篇，亦相懸絕也”<sup>[32]</sup>……筆者也認為這是一篇寫得非常高明的文章，但筆者又認為，再高明也不能否認它是一篇干祿的文字。與三篇《上宰相書》相比，它不是直接上書，而是間接上書；不是直接干祿，而是“曲線”干祿——二者精神實質是一致的。它的“活”和“超前而斷後”，在於它是用標榜對增進學問、品行問題進行辨析的題目，巧妙地繼承和改造了漢辭賦中“設客難己”的形式為“借客伸己”的形式，在取媚、穩住(即時語的“搞定”)“執政”的基礎上，借客(學生)之口，盡情地誇耀了自己在道和學方面的輝煌成就，盡情地、誇大其辭地哭訴了自己的窮(如文中“冬暖而兒鳴寒，年豐而妻啼饑”等語)，“以怨懟無聊之詞托之人，自咎自責之詞托之己”<sup>[33]</sup>，“把自家許多伎倆，許多抑鬱，盡數借他人口中說出，而自家却以平心和氣處之。看來無歎老嗟卑之跡，其實歎老嗟卑之心，無有甚於此者”<sup>[34]</sup>。整篇文章，就是韓氏自炫、自誇、自傷、自怨、自解的對白，是一人用兩種曲調在唱說自家的光榮、不幸和灑脫，是如金庸筆下的周伯通在用自己的兩拳進行永不分勝負的對打……目的只有一個：引起“執政”對自己的注意、同情、憐惜、欣賞、提拔！比起十八年前“閱世未深，而自守未

定”<sup>[35]</sup>時所撰的《上宰相書》中所表現出來的“躁進”、逞才和急不擇言，十八年後《進學解》的圓熟、“句句欲活”、“平心和氣”，欲擒故縱，更能收到干祿的效應。“改比部郎中，史館修撰”的高陞，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。

還需多說幾句。歷代的一些評論文章，在為《進學解》叫好的同時，也忘不了捎帶對漢代東方朔的《答客難》、揚雄的《解嘲》等主客問答體辭賦贗上幾筆，以顯示《進學解》的“超前而斷後”（見前引例）。這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。《進學解》與《答客難》、《解嘲》相比如何？高在哪里？清人曾國藩有過比較評價，曰：“《進學解》仿東方朔《客難》、揚雄《解嘲》，氣味之淵懿不及，而論道論文二段，精實處過之。”<sup>[36]</sup>這是獨具隻眼的識見。“氣味”是什麼？意趣和情調（依《辭源》解釋，其實也可以釋為格調）。《進學解》的意趣情調為什麼“不及”《答客難》、《解嘲》“淵懿”（深刻、美好）？曾文正公沒有進一步分析下去。筆者推測，曾文正公應是也窺見《進學解》中之干祿“氣味”，否則，何以在一片抑《客難》、《解嘲》而揚《進學解》的聲潮中獨辟此說？那麼，《答客難》和《解嘲》的“淵懿”之處又在哪里？此不屬於本文探討範圍，故筆者不予細析，但此二文“托古慰志，疏而有辨”，“回環自釋，頗亦為工”<sup>[37]</sup>，其思想價值前人已多有肯定。茲從《文選》卷45各引二文一段文字，以見其斑：

故綏之則安，動之則苦；尊之則為將，卑之則為虜；抗之則在青雲之上，抑之則在深淵之下；用之則為虎，不用則鼠（東方朔《答客難》）。

當今縣令不請士，郡守不迎師，群卿不揖客，將相不俛君，言奇者見疑，行殊者得辟（揚雄《解嘲》）。

前文揭露專制君主對“處士”隨意與奪的威勢，後文抨擊官場的腐敗與傾軋，才真是“表現了一個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現實中不能妥協的精神”！

韓愈是文學史上的巨匠，也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，尤其在政治和節操方面，更是毀譽參半。但不管其在歷史上的功過如何，有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，那就是朱熹所言的“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、抑邪與正為事，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”<sup>[38]</sup>。“貪位慕祿”是韓氏一生的追求，也是被人垢病最多之處。“然考其平生意嚮所在，終不免于文士浮華放浪之習，時俗富貴利達之求”<sup>[39]</sup>。“若韓退之上書於執政，惟急於干祿而求效力當時，故君子譏其躁進”<sup>[40]</sup>。連對韓氏相當崇拜的清代學者林雲銘，對其“急於干祿”的“躁進”也不以為然，並表示惋惜：“茲讀昌黎三書（即《上宰相書》三書——筆者），似未能脫於弊俗。余嘗謂以人事君者，宰相之常職；炫鬻干進者，士類之醜行……況彼碌碌者，顧往干瀆再三。山斗之名，以此安能無減價哉？”<sup>[41]</sup>

本文無意對韓氏一生行事進行評價，僅就其享譽日久的幾篇文章加以分析，提出一些不同看法；所論未敢言是，權作引玉之磚。另者，本文指出《進學解》是一篇干祿文字，也不等於完全否定或抹煞其價值，曾文正公的“論道論文二段，精實處過之”就是指出《進學解》的價值所在。童第德先生在其《韓愈文選》中提出，“《進學解》有它自己的新內容（即一，排斥佛老；二，評文部分有一定的見地；三，對治學和論文有獨特看法）”<sup>[42]</sup>，也是對“論道論文”的更詳盡的闡析，是對《進學解》的價值所在的具體指向。筆者服膺曾、童之論，而不贊同“諷刺”、“指責”之說。不言而喻，《進學解》確實是一篇妙文，是一篇非常高明、非常成功的干祿文章，對比十八年前的三篇上宰相書，韓愈為人及作文的老到、圓熟，對於干祿的遊刃有餘，于此文表現得淋漓盡致。當然，言其“干祿”，是就其寫作初衷及實際效果而言，並非一概罵倒，相信讀者會有這個辨識能力。

註釋：

[1]載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卷16，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。

[2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3《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，清康熙癸酉（三十二年，1693）

原刻本；轉引自吳文治編《韓愈資料彙編》第3冊973頁，中華書局1983年版。以下出處相同者不再標版本。

- [3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2《進學解》評語；轉引自《韓愈資料彙編》第3冊972頁。
- [4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3《上宰相書》評語；轉引自《韓愈資料彙編》第3冊972頁。
- [5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2《進學解》評語。
- [6]清·沈闈《韓文論述·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，清刻本；轉引自《韓愈資料彙編》第3冊1214頁。
- [7]清·吳調侯、吳楚材《古文觀止》卷八《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1978年印本。
- [8]清·沈闈《韓文論述·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。
- [9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3《上宰相書》評語。
- [10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3《上宰相書》評語。
- [11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3《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。
- [12]清·吳調侯、吳楚材《古文觀止》卷8《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1978年印本。
- [13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3《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。
- [14]清·吳調侯、吳楚材《古文觀止》卷8《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1978年印本。
- [15]清·吳調侯、吳楚材《古文觀止》卷8《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。
- [16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3《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。
- [17]分別見宋歐陽修、宋祁等《新唐書》卷150、卷166，中華書局校點本，1975年版。
- [18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3《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。
- [19]後晉·劉昫等《舊唐書》卷160，中華書局校點本，1975年版。
- [20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2《進學解》評語。
- [21]游國恩等編《中國文學史》第2冊167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。
- [22]馮其庸主編《歷代文選》下冊27頁，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。
- [23]朱東潤主編《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》(簡編本)上冊328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。
- [24]清·吳調侯、吳楚材《古文觀止》卷8《進學解》評語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1978年印本。
- [25]載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卷12，四部叢刊本。
- [26]《上李尚書書》，載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卷15，四部叢刊本。
- [27]《送鄭尚書序》，載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卷21，四部叢刊本。
- [28]見宋·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卷四“鄭權”條，岳麓書社1994年版，1998年印本。
- [29]韓愈《與于襄陽書》，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卷17，四部叢刊本。
- [30]唐·孫樵《與王霖秀才書》，《孫樵集》卷2，四部叢刊影印明吳氏問青堂本。
- [31]清·儲欣《昌黎先生全集錄·進學解》評語，清康熙四十四年松齡堂刻本；轉引自《韓愈資料彙編》第3冊921頁。
- [32]清·蔡世遠《古文雅正》卷8《進學解》評語，清念修堂刻本；轉引自《韓愈資料彙編》第3冊1141頁。
- [33]清·吳調侯、吳楚材《古文觀止》卷8《進學解》評語。
- [34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2《進學解》評語。

[35]曾國藩《求闕齋讀書錄》卷8《韓昌黎集·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》評語，湖北咸寧郝經祖刊本；轉引自《韓愈資料彙編》第4冊1486頁。

[36]曾國藩《求闕齋讀書錄》卷8《韓昌黎集·進學解》評語。

[37]南朝梁·劉勰著、范文瀾注《文心雕龍注》254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，1978年印本。

[38]見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·外集·集傳》“新書本傳注”，四部叢刊本。

[39]宋·朱熹《王氏續經說》，《晦庵先生朱文公集》卷67，四部叢刊影印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。

[40]清·劉開《孟塗文集》卷3《上萊陽中丞書》，清道光六年同里姚氏槩山草堂刊本；轉引自《韓愈資料彙編》第4冊1437頁。

[41]清·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評語卷3《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》。

[42]見童第德選注《韓愈文選》136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。